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兼论世界古代奴
及其社会形态

黄现璠 著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兼论世界古代奴
及其社会形态

黄现璠 著

ZHONGGUO LISHI MEIYOU
NULI SHEHU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 / 黄现璠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

ISBN 978-7-5495-6661-7

I. ①中… II. ①黄… III. ①奴隶社会—研究—中国 IV. ①K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0316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大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南宁市高新区科园大道 62 号 邮政编码：530007)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39 字数：800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8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黄现璠教授

制削是封建领主不是奴隶主，是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依据
比公文化实用，^{选经}工奴隶社会不同，确有独到之处。

王亚南先生是经济学家首先翻译资本论^{和教经济学}出名，1954年我们同当第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每届人代会结束后，教育部都选各省各大学

教授的代表去^{开座谈会}谈教育问题，我^他看《人文杂志》1954年七期发表

由^他王亚南先生经济与社会经济引论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问题一文，认为古

代^他亚细亚社会是未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奴隶社会^王先生其他论

著也是^他见解。我^他干脆提出我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论

点和他商量，他很赞同，^他自1954年至打倒四人帮以前，敬

十年的我为^他忘时讳，怕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他整日在心中数十年

苦闷，^他终不敢^{发表}。自打倒四人帮后，^王言说自由，没有顾虑，^王

他^王始敢发表，向同行专家求教，^王塔王先生已^王道^王，^王同我在张

王^王言论未^王写成文章，^王使我^王有^王高和^王王^王，^王只和我学生^王

20x20-400

作者原稿手迹

下编 少数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第十一章

火葬

在自由 发展起来 农村公社 不是奴隶社会 奴隶是奴隶社会有

“奴隶制时代”作 说 古代的希腊罗马可资比较，尤其重要的是我国内的无产民族的情况，能够为我们提供出很丰富的资料。

料。(1) 这就说 中国汉族历史 发生 的奴隶 社会 有多 希腊罗马 的奴隶 社会 可资比较 以希腊罗马 的奴隶 社会 为公式 套用

而不知 历史的发展 依各国 历史发展的 情况不同 而具其 不能 公式化的 套用 我于 上编 已说及。

至说：“我们国内……提供很丰富的资料，
研究过 大数 民族的 历史 的人 绝对 不信 因为 我国 五十 多个 少数民族 除 凉山 彝 族 外 都是 奴隶 社会 或 奴隶 封建 社会 尚 有 单 语 外 其他 各种 没有一个 由 原始 共产 社会 直接 进入 奴隶 社会 这 说 提供 很 丰富 的 资料 一个 都 没有 丰富 在 那里 呢？”

黄现璠传略

黄现璠，原名甘锦英，广西扶绥壮族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

现璠年幼母歿，恃父养之。少孤贫，性颖异向学，伺塾中授业，潜听之。所肄书，皆可熟诵，塾师奇之，特延入馆。然家贫如洗，所读之书皆借于人，故刻厉益甚，晨起鸡鸣，夜读月下，勤勉如此。

民国十五年，会北师大举士，现璠苦习三昼夜，应试中扶南县头名。是岁获录，负笈赴京，入北师大预科。所阅颇广，喜史籍，好《日知录》，心折亭林。越二年，复入史学系，师从陈垣、钱玄同、邓之诚、萧一山、陶希圣诸贤。以资罄，遂谋职助学，兼授国文、历史。不数年，学有所成，举送研究所，治考据、音韵诸学。北师大习史，凡九年，穷搜西洋诸典，得鲁滨逊之说，欲以彼之精华，匡我之不逮。是时，倭衅关外，以窥中原，现璠深疾之。继而撰文过之，欲省国人。初，文呈钱玄同，评曰：“观念进化，议论激昂。持之有理，点评中肯。”遂荐校刊之。而现璠平生治学之旨“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盖自此始。

民国二十一年春，立蓓蕾学社于北京私立文治中学，出版进步书籍，以扬新文化、新文艺、新史学、新教育为旨。

民国二十四年秋，欲赴美游学，资乏未行。或闻日本西学盛，遂东渡，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习史学。翌年春，得桑梓资给，攻博士学位。其间，交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后藤朝太郎、宫崎市定诸名士，往复论学。时郭沫若同旅日，现璠屡造府拜谒，与之切磋春秋大义。

民国二十六年夏，七七事起，现璠还国，充教职，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桂林师院教授。又兼《国防周报》编撰，抽笔承明，以振国人。逮及日本乱华，现璠时任国

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寇至桂，桂师南迁，现璠从之，讲学于战时临时校舍，曰：“国人团结，必灭倭寇，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后其言果验。现璠以笔代枪，以史为证，匡正时惑，竭力至诚激昂保家卫国。阵前有百战金甲敢勇当先，阵后有名师万众声援激励，是故中华得不亡也。又时一变学风，足入桂黔山邑，考察壮、苗、瑶诸族，受益称丰。

民国三十四年，倭降返桂，任广西大学教授，还除训导长。

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长。又素与国民党有隙，以民国进步左派名士，授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民委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

一九五二年夏，只身南下扶绥、崇左、大新、德保、靖西诸县，行走于山邑瘴乡，捃查古迹，考纪其地土风俗之实据，冥讨穷搜乡邦文献，以参相校订，志于修纂僮族史也。

一九五三年夏，建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于广西大学，任组长，西行忻城、宜州、罗城、河池、南丹、天峨、东兰诸县，调查白裤瑶族、背篓瑶族、毛难族、红苗族、壮族、水家族、仡佬族之历史、文化、风俗，搜罗民间文物。同往者，凡十五人。

一九五四年春，独往贵县，询黄鼎凤遗事及访太平天国史迹。

一九五五年春，独自复走扶绥、崇左、龙州、大新、德保、靖西诸县。挈其壶，挟其本，徒步入壮乡重山复岭，致力于田野调查。瘴海游走，逶迤导其披林莽，前行没胫沙蓬松，跋山涉水，蒙犯霜露，劳苦未尝辞。

一九五六年春，只身出桂林，行抵武鸣，往询陆荣廷遗事。继东北行数十里，止大明山。日已昃，望前村瓦屋鳞列，前往寻宿，落泊壮人家。次日，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过石涧，绕山势而行，顺羊肠而上，望镞峰突兀森郁，则已心飞上林。夜入县境，宿民家。翌晨起西行，走村串户，饭于丛山岭寨，一路访询土人，探其地风俗人情。又从上林而东，抵宾阳，至贵县、桂平，沿途穹礴冥搜乡土史料。遇山攀援而登，箕踞而遨；逢野披草而坐，倾壶止渴，则凡数县之域，皆在孤筇双履之下。夏，奉全国人大民委之命，筹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理调查组学术调查主事，率众行走于桂西诸县山邑，经大新、天等，历德保，南还靖西，东折龙

州、宁明。山回路转，坐骑瘦劣，现璠坐骨疼痛不已，毅然坚持不懈，屡咨访乡人不倦，所记口述史料厚也。

其田野调查之行也，不治装，不裹粮，能忍饥数日，能遇食即饱，能饮涧水，能徒步行近百里，凌绝壁，冒丛箐，攀援下上，悬度纓汲。又喜造访土著乡绅、乡老、乡人，虚怀若谷，请问前事，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八桂少数民族山邑之穷乡僻壤，皆几案衣带间物耳。有再三至，有数至，无一一至者。

一九五七年初夏，现璠俯摭旧典，又以十数度田野调查所集之文献史料，修为书曰《广西壮族简史》，为文详于史事，长于叙事，择焉而精，语焉而详，事必有征，考证入细，理无臆设。则自有此书，壮族始有专史，而后世知壮学为专科之学也。夫壮学，研究壮族之学，盖习其史、地、教、言、政、风俗之事。

二十世纪初，夫壮族之究不为专学，其散见于各家之著述者无论已，然其论未立本干，循条发叶。现璠深省之，尝谓：“族之存亡在于史，教本其根也。”继而历数载深究撰述之，欲省族人，意构族史，扬族文化，望成学科，遂创壮族史学，为壮学肇基立鼎，究壮族之壮学始成专学矣。其论壮族史事文化之详，见于其著《广西壮族简史》、《壮族通史》诸书。此所以见推壮学之父，而为新学科之开山也。

现璠尝曰：“夫究壮族之学，切而言之，则关于壮族文化之兴废；远而论之，则系乎壮族之盛衰。”足见壮学于壮族之要耳。夫学术之事，重承前启后，现璠之门生弟子名显世者十八，皆壮族教授，世称“黄门十八贤”，从师教诲，继究壮族之学不辍，修撰不止，事勤文富，斐然述作，数数扩充，壮学由是中兴，“黄派”、“八桂学派”遂成焉。若夫八桂学派，与壮学同兴，自一九五一年始成雏形，迨至二十世纪末，八桂学派诸贤辈出，众习壮学，继而穷之，深耕广耘，揉合政、计、群、哲诸学于其中，并使壮族文化史、文学史入于教本，习于学堂，壮学遂盛矣。

且夫八桂学派，以专研异而分五支。诸分支初发于现璠为师之“黄派”，始于桂林，聚于桂海，合成八桂学派，呜呼盛哉。世谓八桂学派为现璠所创，究其缘由本自有也，盖现璠懿德醇诣，一生授学，默默以忠信笃敬孚于人，绝不事口耳估毕，言论旨趣之见于笔墨者，一一从身心日用间体验天理民彝，以为立身应事自淑淑人之准。其学横贯中西，纵涉古今，敦崇实学，平生留意乡邦文献，尤重采集乡土史料、民间口述史事，以为附益。于历代壮族之起事者，为之援据考定，作铭传以存其人，考证详明，创自古簿录家所未有。持论摒除门户，一洗纠纷，而欲矫历代史家史卷之误，颇有所抑

扬。立说不拘汉，亦不媚洋，成一家之言。厚德载物，仪微绍述，益以昌明壮学及民族学，为一代学术之枢键，今世奉为中国民族学泰山北斗之一焉。文士纷至沓来，入室弟子遂众，私淑者日盛，始成“八桂学派”矣，此所以见推派祖，而为“八桂学派”之开宗也。

一九五八年，当局禁士人清议，大索天下，现璠之名，赫然在史家之首，被指为右派，累受口诛笔伐，沉冤莫白二十春秋。冤际绝兮谁语？终日安坐书斋，手不释卷，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昼夜伏案，废寝忘食，秉笔直书，引经据典，一语正乖谬，一行斥邪理，一段黜怪妄，一页批党义，虽古人故人之骨已朽，必绳以科学之法，读之使人汗出。又笔耕不辍，映日钞书，薄暮不止，未始须臾息，论三代史、民族史、善本故训、生活学，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学术事业。

一九六六年，为红卫兵所扰，被诬诋为“反动学术权威”，遭游街，挨批斗，受挞伐，唾辱身，家蒙籍。

一九七八年夏，复至龙州、凭祥、宁明、崇左等县，作学术田野调查。

一九七九年夏，沉冤昭雪，复起用，任中国民族学研究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授全国政协委员，迭疏奏，力行为人洗冤，时人敬称为“黄青天”。秋，赴百色、田阳、田东、巴马等县，虽年届耄耋，犹老当益壮，倚筇行于山邑僻壤，挥汗如雨，走乡串寨，遍访乡士乡民，请问风俗旧事，作学术田野调查。时又推出“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高论，谓“三代非奴隶社会”，驳郭沫若之说。言既出，举世为诧，后学受熏，承其观，继深研，遂成群言流派，“无奴学派”崭然见头角，今世学者尊之为开山派祖也。

一九八〇年，倡建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会众举为副会长。

一九八一年，立漓江业余大学，任校长。虽已耄耋之年，仍登讲堂，授教解惑。

一九八二年，卒，葬南宁革命公墓。

现璠一生，工于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壮学，博通中英日壮侗瑶语，非常人力所能及。立学社、学科、学派、学会、学校，众举显绩昭然；创黄氏三重证据法，倡“中国生活学”，学术潜绩彰明；学生三千承雨露，栋梁四方铭恩泽，育才实绩易见。而其学品学德学养学识，尽在躬尝践履“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之古贤言中彰显也。其治学，不守章句，有经世志，为文善扶植科学实证道理，缘现代学术为义法，学问宗百家，不墨守门户，旨于求为有益于实学，而不为高谈虚误，以此标榜

于世。其从教，舌耕五十余载，毕生诲人不倦。开科授业，口若悬河，妙语连珠，言词幽默，讲史解其消息盈虚，释其因果得失。又每告生以正直立本、勤勉立业之道，学必如前贤而后已。而其“现场教育法”，或曰“体验教育法”，开先河也。

现璠性情耿介，立身处世，极重躬行，雅操迈时，先左派，后右派，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入世必执言仗义，每闻世间不平事，即刻奋袂攘襟，拍案而起；出世则随遇而安，淡泊名利，置身学海，醉心朝夕神交古贤，秉先哲遗风。望之凝重如山岳，近之温和似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口碑载道。

平生著述丰硕，不复赘列，学者至今尊其书。

妻刘氏丽华，名门之后，毕生教书育人，有子女八，多从教，素称“教育世家”。

甘文杰 执笔

代序一

日前接已故黄现璠(原名甘锦英)先生哲嗣甘文杰先生电话,谓黄老《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一书将付梓,想让我作篇序。本来,按学养和过往,我都是不够资格为黄老的这部遗著作序的,但一来是考虑到文杰先生盛情约请,却之不恭;二来也是念及在粉碎“四人帮”后我是最早站出来呼应、声援黄老的“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并曾在通信中交流过观点,相互鼓励,可谓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下同一战壕中的两个忘年战友,所以也就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吾生也晚,且与黄老一个远在南疆,一个僻处西陲,天各一方,始终未能晤面,但共同的信念、追求,还是把我们拉到一起来了,这或许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缘分吧。

早在读大学阶段,我就对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成说产生怀疑。1962年,我将自己的这个观点写成一篇长文寄呈曾在我的母校山东大学历史系任过教的杨向奎先生和仍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的童书业先生,征询意见。但鉴于当时的形势,杨向奎师谓题目太大,宜仅从古史分期入手去写;童书业师则通过师母给我回信,说是近来身体不好,无力审阅,皆将稿子退还于我。之后,学术环境愈加险恶,我也只好将书稿束之高阁(不是一般的“束之高阁”,而是将它从青海转藏于我苏北乡下老家的妹妹家中),断了刊行问世的念头。

1979年,我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从著名史学家徐中舒师进修先秦史时,看到了黄现璠先生发表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欣喜鼓舞之余,随即通过大学时期的同窗好友、时在广西师院历史系任教的许凌云君的介绍,同黄老取得了联系,并寄去我1979年9月提交给青海师范学院首届科学讨论会的《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历史地位》一文的铅印稿(这是一篇从世界史的角度泛论希腊、罗马外的世界广大地区皆未经历过奴隶社会,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

发展必经阶段的长达五万言的长文),蒙黄老不弃,很快给我寄来相关材料,并在通过徐中舒师转我的信中夸赞我“南天一柱,敢为天下唱”,还让许凌云君转告我“要坚持必胜信念”。不久,我的那篇长文发表在当时尚为内部发行的《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2期上,又蒙徐中舒师推荐,《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2、3期很快予以转载,一时间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黄、徐两位前辈对我的鼓励、奖掖,作为晚辈,我至今难以忘怀。

陈吉生教授曾在《试论中国历史学的无奴学派》的长篇论文中说:

一般认为:“无奴学派”五名家为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

“无奴学派”的开拓支派“黄派”和推进支派“张派”……所谓“黄派”,即指以“无奴学派”导师黄现璠为代表而形成的一个“无奴学派”开拓性支派,成员有黄现璠和“黄门五将”黄伟城、黄增庆、张一民、韦文宣、玉时阶等教授或研究员(皆为黄现璠的学生和私淑弟子)。“张派”是指以“无奴学派”元老张广志为代表而形成的一个“无奴学派”支派,成员包括张广志和“张门双雄”莫金山、李学功教授(皆为张广志的研究生)以及青海、甘肃地区的“无奴论”名士纵瑞华、祝中熹(纵瑞华、祝中熹为张广志在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引者)等人。

陈先生对我的定位显然过誉了,实愧不敢当,而对新时期黄老在这个领域的首倡之功和导师地位的肯定则是准确的。十多年前,我在拙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中,即曾针对有学者将我的《略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一文的发表视为新时期“重新争鸣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历史阶段的开始”的提法说过:“这样提,似不太准确。事实上,从时间的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题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刊登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随后进入这个领域的才是张广志。”(见该书第239—240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不是谦虚与否的问题,而是事情本来如此。它关乎一个人的人格、操守。当今,一些所谓读书人,争名于朝,逐利于市,经常闹得鸡飞狗跳,不可开交,实在是很要不得的。

黄老是一位认真求实、勤于思考、敢于担当的学者。可惜这样的人太少了,也大都都不怎么走时,而一些长于阿上跟风的所谓学者,却能邀功希宠,大行其道。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如果没有那段“左”的漫长岁月,如果能给黄老更多人身和思想的自由,这位勤奋、执着的老先生也许会给我们留下更多史学遗产。可世上没有什么“假如”、“如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所幸上天垂怜,毕竟还给黄老留下了一段虽不怎么长却弥足珍贵的可以比较自由

公表论著的迟暮之年。于是,这才有了已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等文和这部即将面世的遗著。

摆在我面前这部《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的遗著,是沉甸甸的。说它沉甸甸,不仅指皇皇六十万言,部头大,亦指它姗姗来迟,其生也艰,更指它材料丰富,立意高远,有较高的学术含量。

综观黄老这部遗著,给我留下印象较深者略有如下诸端:

一是材料丰富。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流行的是理论套话连篇,不唯不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史准则,甚至为维护某种理论不惜无视、歪曲史料,让史料屈从理论,为理论注脚、服务。长期霸占、笼罩史坛的中国奴隶社会说等,就是这么被生搬硬套炮制出来的。黄老此书则与那些空言误人的所谓学者不同,而是坚持论从史出,靠史料说话。书中,黄老出入古今中外,中国的,外国的,文献的,考古的,民族、民俗学等的材料,多所搜求,读后给人以踏实、厚重的感觉。

二是立意高远。长期以来,主流史学家们从条条框框出发,从欧洲中心论出发,把一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弄得面目全非。黄老此书意在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可谓胸襟广阔,立意高远。按黄老的说法,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是“尧舜时代的族国→夏禹时代的氏国→殷商时代的城国→周代的王国→秦代的帝国”。与之相应的经济制度为“奉公制→上贡制→贡役制→贡赋制→赋税制”。虽然黄老的这一说法并非不刊之论,黄老也从来没有以一个裁决者身份来骤断历史是非,但这种探讨无疑是有益的,是能给人以启迪的,是重建古代中国信史的一个新尝试。这种尝试,亦同任何新东西一样,刚出现时虽不成熟、完美,但总比人云亦云、老生常谈好得多。

三是方法得当。研究历史,从条条框框出发不行,重回乾嘉学派的老路上去恐怕也走不远,故研究历史也还存在一个方法论的问题。黄老不是克罗齐、柯林武德、汤因比,不是刘知几、章学诚,他不可能、我们也不应希冀他为我们提供成体系史学理论、方法,但他在书中尝试着广泛使用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音韵学、历史语义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方法,驾馭材料,解读史事,提取观点,还是甚见功力的。读者仔细品读,定会从中获取教益。

黄老的书尚未细读,说不准的地方尚祈黄老在天之灵和读者诸君宽宥。

张广志^①

2014年3月21日撰于南京

^① 张广志,史学教授,曾任青海师范大学校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现任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

代序二^①

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原名甘锦英)先生的遗作《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兼论世界古代奴及其社会形态》就要正式出版了,黄先生的哲嗣甘文杰先生嘱我作序。身为后辈学人岂敢为学术大家的巨著作序,只是值此佳期重温先哲成就,谈些感想,自我砥砺,以为庆贺黄先生遗作的出版。

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社会形态的研究影响深远。在关于奴隶社会的探讨中,有“无奴学派五家”之说,即黄现璠、胡钟达、张广志、沈长云、晁福林等五位学者均认为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黄先生作为最先提出此说、研究中国社会史时间最长、思考该问题最久的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要,值得学术界高度关注。其实,目前的中国历史学界,社会形态研究已是明日黄花,人们对于有无奴隶社会的兴趣锐减,出版此著的黄先生就在绪论最后也表示愿与学界“以共同写就始于5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史大论战’在中国史坛持续不停又影响至今而现在应该终结的篇章”。黄先生晚年倡导的则是构建“中国生活学”,意在开拓史学理论的新境(黄现璠遗稿,甘文杰整理:《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即将出版的黄先生的这部大作,或许就是“中国先秦史上有无奴隶社会讨论”终结的篇章,本书闪耀着作者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早在20世纪30年代,黄先生就出版了《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大学生救国运动》等社会史专著,名声鹊起。受到师友陶希圣和郭沫若先生的学术观点影响,黄先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长期持有中国古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他开始对郭沫若先生一贯主张的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怀疑,特别是阅

^① 原文标题为“卓尔不群的品格——写于黄现璠先生《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出版之际”,现改为“代序二”,特此说明。

读郭著《奴隶制时代》后更是疑问重重,早在1955年就撰文《我国古史分期应该重新估定》,又于1974年、1976年、1977年、1978年不断修改,终于在1979年题名经改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发表,时年黄先生八十岁高龄,可谓老当益壮。又于1981年写成本书初稿,作为教材印行。黄先生这种坚持自己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不改变看法,勇于挑战权威的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作为“无奴学派”的创始者,黄先生的研究有着自己的特色。《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主要是基于对马克思有关奴隶社会理论的正本清源工作,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经济范畴的名词,不是历史时代排列固定先后的用语。”“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指原始社会,而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经济范畴。”但是,研究先秦社会还需要强大的文字与文献的解读能力,解释各种不同称谓者的身份,本书正是黄先生进行历史学实证研究与新方法结合的力作。黄先生曾在京师求学九年,受教于陈垣、钱玄同等名师,后又留学日本,导师为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加藤繁,他精通中国训诂学,解读传统文献与考证学能力自然胜任。难能可贵的是,黄先生尝试从历史语义学、文化语义学解释中国古代词语,揭示古文字所包含的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信息。不仅如此,他还从世界史的视角对外文“奴”词及其“奴隶”等系列词汇和相关概念考察,并就中外这些词汇概念衍化出的制度和社会形态展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动态研究。这是一本使用多重研究法写成的学术专著,是史无定法的有益实践。本书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实证严密,是作者深厚学术素养的体现,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和价值。

作为“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亲历者和治史五十年的老学者,黄先生对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讨论的历史余响提出看法:奴隶社会在“教条主义”的教化下和“主流史学话语特权”的操纵下成了中国先秦史的社会形态标志,这种根深蒂固的单线思维,甚至成为中国当代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顽疾,向广大学生灌输一种似是而非的“伪历史知识”,学者应当进行除误。这表达了一代史学大家对于历史教育的殷殷寄语,阅读黄先生的大作,我们不但获得大量中外社会历史知识,还获得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学术动力,促进思考究竟何为历史之学。

常建华^①

2014年中秋节前撰于津门

^① 常建华,史学教授,现任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会长,兼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代序三

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是一个可以进行讨论的学术问题。改革开放后史学界出现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学术讨论，即从一侧面证明了这一点。以往的历史学家，已经习惯认为中国先秦史上存在一个奴隶社会，黄老早年同样持有相同史观，他的认识与其学友陶希圣、郭沫若先生大同小异，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49年12月他在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讲授《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课程期间，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开始对历史学家主张的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怀疑，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逐步动摇并开始了转变。由此，他精研马列，边学边写，托思于文，陆续撰成了一些文稿，主张“中华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他的这一主张，早在1957年出版的自著《广西壮族简史》中已有一些表露。只可惜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反右”运动和“文革”十年中他均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以致所谓“黄现璠的反动理论”再也没有市场了。加之昔日动乱年代的政治环境，迫使黄老的许多重要学术研究成果难以公开发表，只能束之高阁，等待时机。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在党中央号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改革开放思想指引下，黄老敏锐地意识到史学界的春天已经来临，于是不顾年高，开始重整旧作，将他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近四十年思考以及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而为此断断续续研究和撰述二十余年的一些文稿进行修改完善，并于1979年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发表了长篇论文《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之探讨》。这是我国史学界在改革开放后公开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第一篇论文，可说最初实现了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贯穿于史学界的理念转化。由此再次激起史学界有关这一问题